



闪耀世界的“红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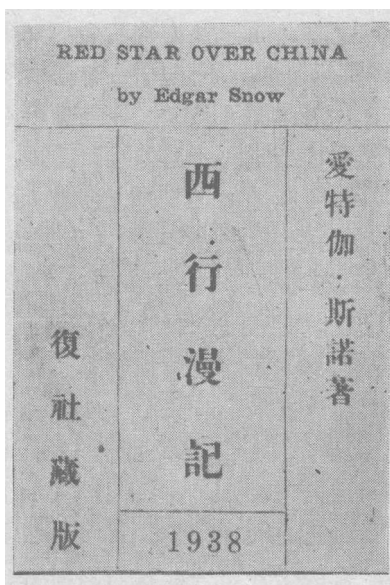
——介绍斯诺和他的《西行漫记》

张小鼎

七十年代岁末一个偶然的机缘，使我及时看到了一部人们盼望多年的重译本新版的斯诺名著：《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此书早在四十年前，当她还处于孩提时代，即已风靡各国，驰誉全球了。可是孕育过她的祖国的人民，近二十年来却难以和她公开见面；八十年代即将来临的前夕，她终于重新回到中国人民的怀抱，使人百感交集，久久难以平静。

一个美国进步作家报道三十年代中国革命真相的名著，最早是在英国出版诞生的，其后才相继在作者的祖国和第二故乡美国与中国翻印出版，度过她的童年；当她周游世界，闻名于全球时；而在最初孕育过她的中国惨遭禁锢，这仿佛有点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在“四人帮”实行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恣意横行时，人们要想寻找一部《西行漫记》来阅读，岂不要比冒着生命危险潜入海底捞取一颗明珠还难吗？！

今天的青年读者手捧这本名著阅读时，也许并不感到怎么特别的新奇和幸运；然而如果让我们回忆一下作者斯诺采访写作此书的传奇式经历，以及《红星照耀中国》在世界和中国流传的情况和影响，或许会有助于更好地了解认识此书的价值和意义吧。



（一）

美国进步作家、杰出的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于1905年7月19日诞生在美国中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一个贫苦家庭。年青时当过佃工、铁路工人和印刷学徒。1928年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毕业后，开始从事新闻工作，在堪萨斯城的《星报》和纽约的《太阳报》崭露头角。

不久，他怀着一颗充满幻想和好奇的心，决定周游世界。1928年，当中国的大革命陷于低潮时，他终于远渡重洋风尘仆仆地来到我国上海，在旧中国度过了十三年。斯诺到上海后，担任了《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通讯记者，以后又担任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的特约通讯员。从1930年后的八年间，为采集新闻，他曾遍访中国的一些主要城市和东三省、内蒙古及台湾，又曾游历了日本、朝鲜、缅甸、印度及婆罗洲等地。

在上海时期，斯诺结识了鲁迅和宋庆龄等人，相互建立了真挚感人的亲切友谊。斯诺后来曾对中国朋友说过：“鲁迅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①正是在鲁迅先生指引下，从1931年前后开始，斯诺花费了约五年时间和他当时的妻子海伦·福斯特（即

《续西行漫记》的作者尼姆·威尔士)一起,编译了一部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活的中国》,把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以及三十年代其他一些青年作家的优秀短篇创作,及时地介绍给西方世界的广大读者。通过此书的编译,使斯诺深刻地认识了旧中国黑暗的现实,后来他认为《活的中国》的编译是《西行漫记》写作的前奏。

这期间斯诺还亲身经历和目睹了1932年的淞沪战争及1933年的热河战争,他迅速撰写了许多真实感人的通讯报道给纽约和伦敦的报刊;后来又写了《远东前线》,这本书被人们誉之为“关于远东问题的一本标准英文著作”。

1933年春天,斯诺从上海来到北平,执教于燕京大学新闻系,同时开始学习中文,接触了不少革命青年学生和党的地下工作者。他积极支持和亲自参加、采访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和1939年他又两次进入西北苏区访问。1941年蒋介石悍然发动了“皖南事变”,由于斯诺及时地对这一事态作了真实的报道,国民党反动派迫使其离开中国。

四十年代以后,斯诺作为美国《星期六晚邮报》的副主笔,足迹涉及非洲、伊朗、苏联、法国、德国和奥地利等国家,从事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亚洲和欧洲重大事件的采访和报道。

五十年代,斯诺热烈向往着革命的新中国;但由于麦卡锡主义的迫害,美国联邦调查局把他视为危险分子,禁止报刊发表其文章,他不得不举家迁往瑞士定居。

1960年,1964年,1970年他冲破阻力,三次来华,受到毛主席、周总理及我国其他有关领导人的多次亲切会见,并深入到工厂、农村进行参观采访,撰写了许多介绍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文章。1972年2月15日凌晨,斯诺因患癌症在瑞士逝世,终年67岁。毛主席在给斯诺亲属的唁电中说:“斯

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遵照斯诺的遗言,他骨灰的一半已于1973年10月安葬在北京大学风景秀丽的未名湖畔。周总理亲自参加了骨灰安葬仪式。

斯诺一生写过十余部书籍。其中,不少写中国的:如《远东前线》(1933年出版)、《为亚洲而战》(1941年出版)、《红色中国杂记》(1957年出版)、《今日红色中国:大河彼岸》(1962年出版)、《漫长的革命》遗稿(1972年出版)等;但使美国 and 全世界人民最早了解中国革命真像的,却是四十年前出版的这部史诗般的报告文学巨著——《红星照耀中国》。

(二)

《红星照耀中国》是在什么条件下写成的呢?

众所周知,早在一九三五年十月,红军即已完成了举世闻名的“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然而,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恬不知耻地制造了种种蛊惑人心的谣言,千方百计地严密封锁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一切消息,所以中国革命的真相,对世界各国人民来说,也完全是一个难以猜测的“谜”。为了搞清陕北苏区这个“未知之地”的真实情况,揭开这个举世之“谜”,斯诺决心秘密前往苏区。在得到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两家报纸的赞同支持后,经宋庆龄和华北地下党组织的具体帮助和安排,斯诺于一九三六年六月满怀喜悦之情,带着一封用隐显墨水写的致毛主席的介绍信,加上“两只照像机,二十四个胶卷,还有足够的笔记本,”^②极为秘密地从西安出发,开始了影响他一生的“陕北之行”。

斯诺进入苏区见到我党的第一个负责人就是周恩来同志。在周恩来同志亲切关

怀和周密安排下，斯诺作为进入苏区的第一个西方新闻记者，开始在这里进行了四个多月的紧张的采访活动。当时华北地下党组织对斯诺的这次访问十分重视，为了减少语言上的隔阂，特地派了还在求学的王汝梅（黄华）同志担任斯诺的主要翻译；吴亮平同志则承担主席与斯诺谈话的翻译。

在陕北苏区，斯诺广泛深入地了解根据地军民的战斗、生产、学习和生活，记录了有关陕北根据地见闻的十分珍贵的第一手材料，所做笔记就达十几本之多。斯诺日后写作近三十万言的《西行漫记》一书时，除了有关“西安事变”和《关于朱德》部分，援引尼姆·威尔士的笔记材料外，全书主要依据的正是他亲自采访的这些极为丰富和生动的素材。

他和毛主席、周总理的多次会见交谈，以及对彭德怀、林伯渠、徐特立等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采访，特别是他们的长征经历并由于他们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使斯诺思想受到了极大的教育和鼓舞，对中国共产党、红军战士和中国革命战争有了较为深刻的正确认识。当斯诺秘密地胜利返回北平时，国民党反动派竟从西安发出一则谣言，说“斯诺被红军处决了”，美联社亦信以为真。为了及时揭穿国民党的谎言，斯诺立即到美国公使馆去出席记者招待会，公开了他的陕北之行的主要事实。并且把他同毛主席长篇谈话的全文，连同对红区现状的综述，寄交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发表。这自然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十分轰动。

在北平近郊燕京大学校园里，当斯诺用饱含深情的笔触紧张地写他的陕北之行时，尼姆·威尔士这时几乎把她自己“所有的时间用在整理埃德加一切的笔记、照片说明文字、会谈记录等等上”，^③以使斯诺尽快地把一切东西争分夺秒地发表出来，终于在芦沟桥事变前几天，斯诺完成了他的《红

星照耀中国》一书的最后一章。全文首先发表（分期连载）在梁士纯与斯诺夫妇等人创办的英文杂志《民主》（Democracy）上，这个杂志虽然总共只出版了六期，（因抗战爆发停刊），“但却象黑夜的一道闪电一样给人以启示”，^④颇得国内外好评。

至于斯诺写作《西行漫记》的指导思想，他后来曾在一篇序言中十分谦逊地说：“这一本书绝对不能算作正式的或正统的文献。在这里我要做的，只是把我和共产党员同在一起这些日子所看到，所听到而且所学习的一切，作一番公平的、客观的、无党派之见的报告。”^⑤正由于斯诺的公平、客观，使他有可能较全面深切地理解他在苏区耳闻目睹的一切，对自己所报道的人物、生活、事件产生深沉的爱恋之情和发自内心的强烈共鸣。

（三）

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英文本由伦敦维克多·戈兰茨（Victor Gollancz）公司出版发行，仅一个月就畅销了五版。

斯诺对它的问世是极为珍视的。从它的命名用意可窥见一斑。据有的同志回忆，斯诺曾为它拟就五、六个题名：《在陕北的数月》、《红区访问记》、《红星照耀中国》……；并分别征求听取了一些人的意见，斟酌再三，终于决定取用不少人都喜欢的《红星照耀中国》这个题名。^⑥

1937年3月4月间，北方王福时等曾将该书节译出版，名《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

当《红星照耀中国》英文本付印后，斯诺本打算在中国北方立即出版此书的中译本，并曾和他的助手许达（即郭达）译过一部分，由于战争爆发，彼此分手，未能如愿。1938年2月最早的完整的中译本《西行漫记》终于由“复社”在上海“孤岛”秘密地印行了。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党所领导的抗

日救亡组织一律被严加取缔。上海进步文化界在胡愈之同志发动和倡议下,由郑振铎、周建人、许广平、胡仲持、冯宾符、张宗麟等同志共同集资组织了一个“复社”。他们利用当时出版印刷萧条,纸张价格低廉的情况,想方设法,冒着风险,尽力翻译出版了不少马列著作和进步书籍。而“复社”使日本驻上海的宪兵队大为震惊的第一部书,就是出版《西行漫记》。

据胡愈之同志回忆,当他从斯诺那里借到刚从英国航空寄来的《西行漫记》英文本样书阅读后,真是不胜欣喜,认为它确是“一本难能可贵的著作”。但对作者和此书的写作背景不很清楚,就找上海中共临时办事处的刘少文同志了解;当他弄清情况,并征得地下党组织的同意后,便首先在“星二座谈会”上提出翻译出版此书的问题。所谓“星二座谈会”是由当时漂泊在上海租界的一群抗日救亡人士所组织的定期集会,即每星期二在八仙桥青年会地下室餐厅开会座谈讨论如何进行抗日宣传问题。在胡愈之同志倡议和一部分中共地下党员的推动下,决定由参加座谈的王厂青、林淡秋、胡仲持、梅益、冯宾符等十二人集体动手,分别承译。

考虑到此书的内容和当时环境,书名较隐晦含蓄地译作《西行漫记》。在此以前,范长江同志曾于1935年7月以《大公报》旅行记者身份,进行过历时十个月,行程四千余里的著名的中国西北地区考察旅行,并写了许多轰动一时的旅行游记,首次向全国广大读者公开报道了红军和二万五千里长征以及我党在西北地区的真实情况,以后这些游记汇集为《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出版。明眼读者一看《西行漫记》就很自然地联想到我们的党和西北苏区了。

据胡仲持回忆当时印刷资金的筹措情况说:“当时十多人每人捐出五十元买纸张,几十人通过自己的社会关系,东奔西走征集到读者预约金几百元作印刷成本,另外

一些人干了一阵子零零碎碎的义务劳动。”^⑦就这样,在抗日救亡群众的协助和印刷工人同志的支持下,《西行漫记》从1937年12月开始翻译,1938年2月出书,中间仅用了短短的一个多月的时间,其速度之快,在现代出版史上是罕见的。

初版精装本是大32开,暗红色漆皮面(二版后改为红布面精装)。扉页上以醒目的字体标明:《Red Star over China by Edgar Snow》,《西行漫记》,1938年,复社藏版。封里和书底内附描绘精致的长征路线图和西北边区图两帧。书内还附有斯诺在陕北采访时所摄珍贵照片、插图。

书前的译者附记中,特别强调“这是复社出版的第一本书,也是由读者自己组织,自己编印,不以营利为目的而出版的第一本书。”斯诺除对英文原著的文字作了少许增删外,还应约于三八年一月二十四日为中译本写了一篇感情诚挚动人的长序冠于全书之首,他在序文结尾也着重指出,中译本是由“复社”发刊,他愿意把自己的一些材料和版权让给“复社”,希望中译本像“复社”预期的那样,能有广大的销路,以对中国有所帮助;并深情地预祝中国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

《西行漫记》全书共十二章、五十六小节。书中除第四章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来历》为题,描述了毛主席的伟大革命实践外;还十分生动地纪述了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贺龙、林伯渠、徐特立、徐海东……等同志的革命经历。对于举世罕见的“长征”和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以及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也有专章描写。作者还用相当的篇幅,以经济凝练的笔墨对陕北根据地许多“无名”的红军战士、农民、牧民、工人、知识分子做了肖像画式的描写。

作者正是通过这些逼真感人的综述报道,深切地表现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及在党领导下的广大军民的那种不可征服的精神、

意志、理想和力量，雄辩地预言了日寇必败，中国必胜，而共产党人最终必将取得政权，赢得全国革命的胜利。

“复社”印行的《西行漫记》由群众自己组织发行。先发售购书券，凭券取书，出书后即刻销售一空。从二月到十一月短短的十个月里印行了四版，轰动了国内及国外华侨集聚地，在广大读者和爱国侨胞中起了很大作用。在沦陷区和国民党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统治地区，进步的读者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争相传阅乃至辗转传抄，有的青年则怀揣《西行漫记》奔往红星升起的革命圣地——延安。由于《西行漫记》影响很大，马上引起上海日本宪兵队的密切注意，他们下令严加查禁此书，并用种种方法搜寻“复社”的下落，一些同志还为此被逮捕，或遭审讯严刑拷打；由于这些同志的坚贞不屈，敌人虽绞尽脑汁，仍一无所获。

自“复社”印行的《西行漫记》初版问世以来，至今已四十多年过去，然而它的生命力经久未衰，各种中文译本初版、再版接连不断。由于年代久远，资料匮乏，现仅据笔者目前见到的几种版本抄列如下：

（1）王厂青、林淡秋、陈仲逸、章育武、吴景崧、胡仲持、许达、傅东华、邵宗汉、倪文宙、梅益、冯宾符等十二人合译的《西行漫记》。

“复社”1938年2月10日上海初版；4月10日再版；10月10日三版；11月10日四版；1948年大连再版。

（2）史家康、赵一平、王念龙、顾水笔、祝凤池、张其韦等六人合译的《长征25000里》，又名《中国的红星》。

启明书局1949年6月上海新二版。

（3）王厂青等译《西行漫记》

三联书店1960年2月出版。

（4）陈云翻译《西行漫记》（上下两册）

香港南粤出版社1975年11月出版。

（5）董乐山译《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12月出版。书前刊有胡愈之同志撰写的“中文重译本序”及斯诺1938年为复社版中译本所写长序。

随着时间的推移，作者斯诺对英文原著中个别描写错误或不尽妥当之处，总是不断地进行修改，订正，并根据中国战局的发展和实际需要增补充实了新的内容。例如：英文本再版时，他就将第十一章中的一个整节删去；第十章中关于朱德同志的一节完全重新改写；并增加第十三章《旭日上的暗影》——所写大都是关于战术方面的，尤其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著名游击战术做了较深入地探讨和充分的评价。而不同的中译本因依据版本不同，内容章节上也就有一定出入。如史家康等人所译1949年版与王厂青等人所译“复社”1938年版相比，除译文风格不同外，前者还多译出了新增写的有关抗战史料《旭日上的暗影》整整一章。中国文化大革命后，1968年斯诺对原书作了修订，1971年又作了第二次的修改和补充。

最新的1979年12月三联书店版董乐山重译本与“复社”1938年版相比，虽然都是以英国戈兰茨公司1937年版为依据；但由于“复社”版当年未译第十一章中第五节：《那个外国智囊》，因此三联书店新版就比“复社”三十八年版多译出了一节：全书成为十二章五十七小节；同时对英文本中个别史实错误以及人名、地名和书刊名称的拼写错误都逐一进行了校正。所以应该说，这是迄今四十多年来，国内最忠实于原著的最新全译本。

（四）

《红星照耀中国》是一部充满革命激情和鼓舞力量的报告文学巨著。由于它生动、忠实地记述了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斗争，国外评论家称它为“了解中国革命的真正具有

重要历史和政治意义的著作。”在伦敦，英文本一出版，短短几周内就发行了十万册以上；在美国，1938年7月Random House再版时由于新增了第十三章——《旭日上的暗影》，即刻成为有关远东的非小说作品中的第一畅销书，引起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兴趣；不久，俄文本，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广为流传，深受欢迎。以后，法文本、瑞典文本、日文本相继出版，它的作用和影响遍及全世界。

一位侨居国外的文化人，当他深情地回忆曾在他青年时代心灵留下过深刻印象的一些人和书时说：“我记得当时把他（按：指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与斯诺的《西行漫记》一起参读，对共产党在延安的作为有更深切的了解。”^③

一位美国妇女读了《红星照耀中国》后，曾千里迢迢地写信向毛主席致意，表示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钦佩和支持；毛主席以十分喜悦的心情立即致函吴亮平同志，请他代拟一封回信译成英文寄给对方，并特别强调要向她表明“我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是站在一起的。”^④

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在致友人的信中说明他为什么要下定决心来中国参加抗战时，曾说：“请读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和史沫特莱的《红军在前进》，读后你们必将与我同感。”^⑤

一位七十多岁的德国友人，著名的《我曾为毛而战斗》一书的作者安娜·利泽最近曾说：“《西行漫记》这本书真是该翻译出版，它就是过一百年也是有用的。”^⑥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路易·艾黎在《埃德加·斯诺》诗中，这样赞颂他的名著：

“它通过各主要语言，
震撼了全世界。
后代的青年将会
以感激的心情，

诵读他的经典著作

《红星照耀中国》……。”

海伦·福斯特·斯诺曾这样推崇《西行漫记》产生的深远影响：“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有一种永存不息的魅力，至今仍比其它任何一本书更能对中国的思想产生影响。……《西行漫记》的影响力，比我的全部作品和斯诺其余的全部发表的著作加在一起还要大”。^⑦

以上转引的事例表明，为什么毛主席一贯地对斯诺和他的《西行漫记》给予高度评价。毛主席很早就说：“我们将永远记得他曾为中国做过一件巨大的工作。他是为建立友好关系铺平道路的第一个人。”^⑧并热情赞扬《西行漫记》是“外国人报导中国人民革命的最成功的两部著作之一。”^⑨

① 肖乾：《斯诺与中国新文艺运动》（新文学史料1978.1）

② 白夜：《做斯诺式的记者》（新闻战线1979.1）

③ 尼姆·威尔斯《西行漫记》及其他（读书1979.15）

④ 梁士纯：《回忆斯诺》（编译参考1979.3）

⑤ 斯诺：1938年1月24日为“复社”版《西行漫记》所写《序言》

⑥ 陈厚珩：《从〈摩登时代〉的上映想起斯诺》（战地增刊1979.2）

⑦ 胡仲持：《回忆一九三八》（人民日报1956.10.11）

⑧ 董鼎山：《从何其芳著作的英译本谈起》（读书1979.7）

⑨ 吴亮平：《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站在一起的”》（人民日报1979.1.29）

⑩ 敏惠：《跟随“红星”去延安》（北京日报1979.12.25）

⑪ 沈明国：《我们的著作是属于中国人民的》（读书1979.5）

⑫ 张多一译：《海伦·福斯特·斯诺的来信》（新闻战线1980年1月）。

⑬ 斯诺：《红色中国杂记》。

⑭ 同注⑨